

论藏书纪事诗的学术价值及文学史意义^{*}

周生杰

内容提要 自晚清迄今，藏书纪事诗创作不断，经历了奠基、发展、变革和余响四个阶段。藏书纪事诗的创作与晚清学术发展状况密不可分，也与近代以来藏书趋势的转变紧紧相连。作为藏书史与诗集的交融之作，藏书纪事诗具有引领藏书研究热潮、推重古代师法学统和综述藏书渊源递嬗等多方面价值。诗篇虽短，却与传文相映成趣，起到画龙点睛、提纲挈领的作用。作者倾注个人感悟，创造了以纪事、唯实、唯真为特点的诗学模式，构成了情辞谨严的艺术特色。由于征引资料浩繁，藏书纪事诗保存了丰富的文学史料，有助于古代文化研究。

关键词 藏书纪事诗 叶昌炽 学术价值 文学史意义

“纪事有诗，壹皆掇拾历史、地理、风土、人物，广搜博采，以补传记之不及，可备后人之参稽，征文考献，有足称者。”^① 其形式不拘一格，或系之以时，或系之以事，代有名作。至清雍正、乾隆年间，诗坛上出现了两部形式新颖的咏史纪事诗集：一为沈嘉辙、吴焯等七人创作的《南宋杂事诗》，一为严遂成创作的《明史杂咏》。二书皆以“杂”名集，其中《南宋杂事诗》“杂”在稗官野史、方志别集无所不取，所咏史料不主故常，而《明史杂咏》“杂”在体裁上古近体相间。二书于诗歌之后详列史料来源，这种手法“出于创作群体‘补史’的动机，除了补阙前史有资考证外，还力图在稗官野史的民间表达中建立自己的史识态度，着力补前朝遗逸节士和乡邦风物之史，含蓄地表达故国之思等心曲”^②。同样体例的著述还有清嘉庆十八年（1813）刊版问世的施北研《金源纪事诗》，该书“凡八卷二百二十七首，皆仿西涯《新乐府》，每首以三字为题。其子显业等为之注，所采取不出《宋金辽史》、《大金国志》、《续通鉴》、《南宋书》。诗亦仅规模尤西堂”^③，体例上也是诗下有注，诗注结合。

上述三书出，标志以史自注、亦史亦诗的纪事诗体例最终完备，而最为重要的是，它们的体例模式为藏书纪事诗创作提供了直接借鉴^④。

一 创作分期与背景

中国古代诗歌创作有着三千多年的辉煌历史，但是藏书纪事诗却迟至19世纪末始有创作，迄今约有一百三十余年。如果将这—个多世纪的创作进行分期，约为以下四段。

* 本文为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藏书纪事诗研究”（项目编号12BZW082）阶段性成果。

① 潘景郑《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序》，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页。

② 邱睿《别裁诗史补心史——论清代雍乾咏史诗集〈南宋杂事诗〉、〈明史杂咏〉》，《浙江学刊》2009年第4期。

③ 参见李慈铭著，由云龙辑《越缦堂读书记》，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1157页。

④ 本文完稿时，承马亚中师告知，道光时贝青乔的《咄咄吟》、光绪间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亦采用诗与纪事合一的体式。在此敬表感谢。

（一）奠基期——广搜博采，开创体例

此期始于光绪十年（1884）叶昌炽始撰《藏书纪事诗》，止于民国六年（1917）叶氏去世。在阅读书治学过程中，叶昌炽“欲为藏书家人立一传，既读厉太鸿《南宋杂事诗》，仿其体为之”^①，开始了《藏书纪事诗》的创作，并于光绪十六年（1890）完成初稿。叶氏初置之书篋中，偶然被其恩师潘祖荫看到，潘读后极为欣赏，拟为之付梓，但不久离世，此事遂作罢。光绪二十三年（1897），江标将《藏书纪事诗》带到湖南，刊入《灵鹫阁丛书》中，是为六卷的“灵鹫阁本”。该版本流传后，叶氏很不满意，认为“引书舛舛，举例踳驳”^②，这既有刻者求速求快、校勘不精的原因，也有著者类分不明、搜辑遗逸的疏漏。宣统二年（1910），叶昌炽经过认真校定，增补不少内容，另行编排次序，将《藏书纪事诗》重新刊刻，此为七卷的“家刻本”，是为定本。

作为奠基之作，《藏书纪事诗》“专门为藏书家立传，使他们的藏书活动和藏书功绩能昭然于天下，其意义不仅在当时，在今天，甚至在今后，也都是重大而深远的”^③。它为后人研究中国古代藏书家及藏书史提供了翔实的资料和清晰的线索，“仅此一部体裁内容都是空前的巨著，叶昌炽已足以立言不朽”^④。

（二）发展期——赓续前作，反映新变

此期始于民国二十四年（1935），止于新中国成立。叶昌炽去世后，社会发生巨变，藏书界亦然。各地公共图书馆的建设，严重冲击了秘不示人的藏书传统。藏书家群体也注入了新鲜血液，“近来银行家，多喜藏书，武进陶兰泉、庐江刘晦之，其最著者也。闻杭州叶揆初者，亦浙江兴业银行董事，收藏稿本、钞校本甚夥”^⑤，那些拥有雄厚资财的银行家和实业家逐渐成为购书主体。这些变化给藏书史研究提出了新课题，学者们在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的基础上加以开拓，出现了伦明的《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和徐信符的《广东藏书纪事诗》。另外，王献唐在民国二十年（1931）曾云：“尝欲哀集鲁人藏书事实，为齐鲁藏书纪事诗，尚未暇也。”^⑥

1935年，伦明撰成《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先在天津《正风》杂志1935年第20—24期和1936年第1、2、3、5期连载。不久抗战爆发，《正风》停刊，伦明尚有若干首没有发表，直至抗战胜利后，始刊入叶恭绰纂辑的《矩园余墨》丛书中。此书之作，为伦氏有感于史上私人藏书家众，而名为通代之作的叶书遗漏甚多，“且廿余年来为变甚剧”，并断言“今后藏书之事，将属于公而不属于私”^⑦。

差不多同时，徐信符在广州修建藏量丰富的南州书楼，出于对广东地方文献的热爱，他亦撰有《广东藏书纪事诗》一书。徐氏去世后手稿曾经叶恭绰先生校阅，刊于民国三十八年（1949）之《广大学报》“建校二十周年纪念特刊”，题曰《广东藏书纪事诗稿》。该书“收广东自明代以迄民国藏书家数十人，详述广东典籍聚散之源流，阐扬藏书家之潜德，洵为不朽之作”^⑧。

伦书所收藏书家皆辛亥以后人，从时代上赓续叶书；徐书所收藏书家以广东为主，凸显地域特色，补叶书所不及。此外，《藏书纪事诗》的注、传均为辑录体文献，而伦、徐二书的传文则属笔记体。这是因为，二人著述收录的传主以同时代人居多，以亲见亲闻替代文献辑录，更见史料价值之高。

① 叶昌炽《奇觚庐诗集》卷中《再题简末二十七叠前韵》诗后注，《续修四库全书》，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1575册，第208页。

② 叶昌炽著，王欣夫补正，徐鹏辑《藏书纪事诗》叶氏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9页。

③ 金振华《叶昌炽研究》，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53页。

④ 苏精《叶昌炽治墙室》，《近代藏书三十家》，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17页。

⑤ 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北京燕山出版社1999年版，第131页。

⑥ 王献唐《双行精舍书跋辑存》，齐鲁书社1983年版，第180页。

⑦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自序》，第4页。

⑧ 《广大学报》编辑部《〈广东藏书纪事诗〉前言》，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稿》，《广大学报》1949年第1期。

（三）变革期——增益故实，有裨学术

此期始于新中国成立，止于“文化大革命”开始。新中国成立后，政治上的变革亦体现在文化领域，藏书纪事诗的创作也一样。它逐渐走出旧有的视域，开启了崭新的创作篇章，主要有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和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

《续补藏书纪事诗》为王謇晚年所作，此书“补缘督先生所未及，且有裨藏书家之故实焉”^①，收录了晚清民国以来的诸位藏书家，增益了许多藏书故实。其鲜明特色是：重在彰显学者藏书，体现“聚书为藏”向“藏书为用”的转变；重视藏书流向，记述诸多藏书逸事；所记藏书家事迹多为亲眼所见，刻画藏书家形象较为生动；考辨精审，有裨学术研究等。又有安徽宣城人吴则虞长于训诂，四部皆精，“尝步武清叶昌炽先生作《续藏书纪事诗》”^②，诗中“赖素”条下注曰：“泣数行下，自是不复见，以丙午岁卒。”^③“丙午岁”即1966年，此书撰写时间当在该年后不久。在后续诸作中，《续藏书纪事诗》最类叶书，诗后之注取自各类文献，并附有藏书室、藏书印信息。

（四）余响期——搜扬潜逸，继续有绪

吴著之后，藏书纪事诗的创作沉寂了二十多年，但是，这种流行了近一个世纪的诗体尚未成为绝唱。20世纪80年代末，先后有周退密、宋路霞《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和蔡贵华《扬州近代藏书纪事诗》等续作，故将此期称为余响期。

《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对上海这个近代最大出版中心、古籍集散中心的私家藏书活动作了最详细、最系统的调查总结。该书先在上海书店出版的《古旧书讯》上陆续发表，1993年由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结集出版。全书收诗六十首，纪事六十家，远自丁日昌，近至丁景唐，跨度一个世纪，基本囊括了近代一百年来出生或者客居上海的主要藏书家。尤为可贵者，“藏书纪事诗往例，皆出一人之手，今乃合力为之，亦属创格”^④。

周、宋二人的创作给扬州学者蔡贵华很大的启发，其云：“近来，有些人用纪事诗来表彰各地藏书家，上海已开先例（事见《读书》1988年第1期）。兹将近代扬州藏书家中声望卓著者仿清人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体作一概述。”^⑤书成后先是油印分赠好友，后刊于扬州一内部刊物，故长时间不为学界所知。近代扬州经济文化呈不断衰落之势，与明清时的隆盛相比，私家藏书风光不再，故蔡作仅收十五位传主，而以藏书世家为多。

藏书纪事诗的创作在图书史、文学史上影响深远，标志学术界对于古代私家藏书文化的研究步入正轨，其创作与晚清学术发展状况密不可分，也与近代以来藏书趋势的转变紧紧相连。

一方面是考据学的推动。藏书纪事诗的创作始于晚清并不是偶然的，这是因为清代考据学主要以古代典籍为研究对象，内容包括整理、校勘、注疏、辑佚等，根本治学方法是“实事求是”和“无征不信”。自顾炎武始，有清一代的考据学者潜心研究，对两千多年来的传统文化典籍，尤其是儒家经典进行了整理训释。更为重要的是，他们以整理古籍为基点，研究兴趣逐渐转向藏书掌故、藏书家和藏书史。明末清初大学者钱谦益曾“欲取吴士读书好古，自俞石涧以后，网罗遗

① 潘景郑《续补藏书纪事诗后记》，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书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69页。

② 吴受琬《悼念我的父亲——吴则虞教授》，《四川图书馆学报》1979年第4期。

③ 吴则虞《续藏书纪事诗（关于四川藏书家部分）》，《四川图书馆学报》1979年第4期。

④ 郑逸梅《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序》，《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第2页。

⑤ 蔡贵华《近代扬州藏书纪事诗》，《扬州史志》（内部刊物）1989年第2期。按，笔者从2012年11月起，多方寻找蔡著，先后致信朱江教授十多次，并亲往南京和扬州寻找，皆无果。2013年6月，罗加岭先生从网上得知笔者寻找讯息，主动联系，将珍藏多年的内部资料拍照发来。在此对朱江教授、罗加岭先生诚表谢意。另，“事见《读书》1988年第1期”，指的是该期发表的胡道静《谈“〈藏书纪事诗〉体”》，该文系作者为《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所作的序，可知《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成书于19世纪80年代末。

逸，都为一编，老生腐儒笥经蠹书者悉附著焉。庶功甫辈流不泯泯于没世，且使后学尚知有先辈师承在也”^①，但由于种种原因，此事搁浅；顾千里亦曾“举藏弃源流，汇所见闻，述为一编，稍传文献之信”^②，惜原书不见传；嘉兴学者马玉堂曾创作过《历代藏书编年纪要》，但是后人未曾目睹，推测起来或未成，或遗失。

与上述诸人或曾有计划、或著述遗失不同，郑元庆《吴兴藏书录》和丁申《武林藏书录》则得以保存下来。其中《吴兴藏书录》是范锴自郑元庆《湖录》辑出，该书“载自有代以迄明季藏书者一二十家，并采收藏事实”^③。而丁申《武林藏书录序》云：“武林为浙中首郡，天水行都，声名文物，甲于寰宇。士多好学，家尚蓄书，流风遗韵，扇逸留芬。历岁既深，或遭兵火，或替云初，既毁缥緗，并亡簿录，无缘覆瓿，遑论借瓿乎！申幼耽竹素，长阅沧桑，既抱文澜之残帙，更补书库之阙编，遗馥则卷守八千，末学则略窥万一。采公私目录，备古今掌故。”^④

郑氏和丁氏之书着意于收集一地之藏书掌故，难以反映史上众多藏书史实，却引发了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的创作。叶氏“叹自来藏书家节衣缩食，鸠集善本，曾不再传，遗书星散，有名姓翳如之感。因网罗前闻，捃摭逸事”^⑤，终成此书。

另一方面是藏书风气转变的推助。近代以来，由于民族危机加重，复古思潮涌起，学术上讲究经世致用。嗜古好旧的藏书家一方面广购宋元秘本、古旧刻本；另一方面畅言变法，广开书藏，以开启民智。振兴国学、保存民粹的嗜古之风与学术为天下公器的公藏思想有机结合，大大促进了近代公共藏书事业的建立和发展。此外，近代商业经济的发展催生出一批藏书为售的书贾，他们以追逐利润为目的，不惜将大量的珍贵典籍售出国门，造成了传统文化的流失。伦明等人的藏书纪事诗对此种风气多有关注，并断言“今后藏书之事，将属于公而不属于私”^⑥。

二 学术价值

私家藏书历史悠久，早在春秋时期，“士”阶层的兴起突破了统治阶级对文化的垄断，改变了学在王官的局面，涌现出一大批哲人及思想家。他们著书立说，开门授徒，私家藏书悄然兴起。此后几千年当中，私家藏书蔚然大观，成为古代文化重要组成部分之一。宋以后，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藏书更为便捷，文献中开始有了关于藏书家故实的记载，如司马光《涑水纪闻》，邵博《邵氏闻见录》、《邵氏闻见后录》，黄伯思《东观余论》，叶梦得《石林燕语》，晁公武《郡斋读书志》，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題》等。明清以降，多数学者开始专门汇集古人藏书事迹，总结藏书经验。但是，这些多是断代或限地域的故实汇集，缺少系统的归纳研究，难以尽载全部藏家史实，那些在图书典籍、文化学术上贡献丰硕的藏书家，“节衣缩食，鸠集善本”，而死后往往“名姓翳如，不挂通人之口”，“缥緗既散，蒿莱寂然”^⑦。直到藏书纪事诗问世，藏书史才真正确立了研究范式。

从体例上说，藏书纪事诗之体介乎“史”与“集”之间，是藏书史与诗文集的交融之作，几部影

① 钱谦益《牧斋初学集》卷八四《题钱叔宝手书〈续吴郡文粹〉》，《续修四库全书》，第1390册，第421页。按，钱氏《列朝诗集小传》丙集卷九“朱处士存理”条亦有类似的话：“余尝欲取吴士自俞石涧、王光庵以后，网罗遗佚，都为一编，而吴岫诸人亦附著焉，庶几前辈风流，不泯没于后世，且使吴人尚知有读书种子在也。”（《续修四库全书》，第1623册，第347页）

②⑦ 《藏书纪事诗自序》，第30页。

③ 郑元庆《吴兴藏书录范锴序》，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5页。按，文中“有代”一作“五代”。

④ 祁承燦等《澹生堂藏书约》（外八种），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丁申《武林藏书录》第1页。

⑤ 《藏书纪事诗王颂蔚序》，第4页。

⑥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自序》，第4页。

响很大的目录书更是直接将其纳入“史”的范畴,如《清史稿·艺文志》将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归入目录类,《中国丛书综录》因《清史稿·艺文志》之例,而王澐直言“目录版本家不可无此两作也”^①。下文从史学角度,考察藏书纪事诗的学术价值与影响。

(一) 引领藏书研究热潮

近人汪闳称叶昌炽《藏书纪事诗》“网罗前闻,捃摭逸事,搜扬潜德,阐章之功,诚不朽矣”^②,评价主要针对藏书研究而言。叶书之出,藏书研究步入正途,傅璇琮和谢灼华二位先生说:“对于中国藏书文化,自从叶昌炽结撰《藏书纪事诗》而开启了总结研讨之风以来,先后出现过两次研究热潮。”^③

第一次热潮形成于19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后因日寇侵华而告中止。这一时期的藏书史研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出现了一系列相关著作,如洪有丰《清代藏书家考略》,杨立诚、金步瀛《中国藏书家考略》,吴晗《两浙藏书家史略》、《江苏藏书家小史》,潘博山《藏书家尺牋》,叶德辉《书林清话》,蒋吟秋《吴中藏书先哲考》,陈登原《天一阁藏书考》、《古今典籍聚散考》,等等,“皆以《藏书纪事诗》为其滥觞……凡此胥由鞠裳之发闡而诸藏书家得以不泯没也”^④。二是各地举办了多场文献展览会,主要有1936年举办的嘉兴文献展览会、浙江文献展览会(杭州),1937年举办的吴中文献展览会(苏州)、上海文献展览会、淮海文献展览会(徐州)、漳州文献展览会和察哈尔文献展览会(张家口),1940年举办的广东文物展览会(香港)等,展览会秉持“凡属乡贤遗泽,类详其人之生平行事,以资表扬”^⑤的宗旨,通过开设专室、撰写文章等对私家藏书楼和藏书家广为宣传。

从19世纪80年代始,中国古代藏书研讨渐入佳境,到90年代后期形成新的学术研究高潮。在这一时期,研究者继续叶昌炽等开辟的路径,并不断探索,先后整理出版了一批著名藏书家的藏书目、信札、书话等,如傅增湘《藏园群书经眼录》、黄裳《前尘梦影新录》、李盛铎《木樨轩藏书题记及书录》。同时,学术界还为藏书家、藏书楼撰写多部传记、辞典,如顾志兴《浙江藏书家藏书楼》,徐雁、谭华军《续补藏书纪事诗传》,苏靖《近代藏书三十家》,李玉安、陈传艺《中国藏书家辞典》。诚如金振华先生所说:“《藏书纪事诗》的问世,封建社会中叶以来藏书家的藏书成就及其文化学术史贡献因此得以集中展示,从而使藏书史的研究成为中国文化史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⑥

进入21世纪以来,藏书研究不断推进。历代藏书家题跋和书目集得到编印,早期藏书史论著得以订补再版,断代的和区域的藏书家研究受到关注,中国藏书家个体研究走向深入,藏书家辞典和综论性著作不断出版,中国藏书文化研讨会多次召开,无不表征着学术研究的繁荣。追根溯源,这些成果的取得,均与藏书纪事诗作者悉心搜集藏书家史料、阐彰藏书家事迹的发创开先之功不可分。

(二) 推重古代师法学统

《荀子·儒效》云:“有师法者,人之大宝也。无师法者,人之大殃也。”^⑦以儒家经典为主要研究对象的古代学术,派别森严,十分注重师法传授,凡一脉相沿,信守家法的,称为家数。这一传统代代相沿,入清以来则有积极的变化,那就是学者们虽严守师法,但绝少门户之见,鲜有相互攻讦之恶行,恪守师法亦多见于行文。

藏书纪事诗创作虽为晚近以来之事,但是考究诸作者都有师法渊源,他们深受旧学洗礼,因袭考

① 《续补藏书纪事诗》,第26页。按,引文中的“两作”指的是叶昌炽《藏书纪事诗》与王澐《藏书绝句》。

② 汪闳《明清蟬林辑传自序》,中华图书馆协会1932年版,第1页。

③ 傅璇琮、谢灼华《中国藏书通史》,宁波出版社2001年版,下册,第1022页。

④ 蔡金重《藏书纪事诗引得》,转引自徐雁、谭华军《续补藏书纪事诗传》,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79页。

⑤ 浙江图书馆《浙江文献展览会专载·序例》,《文澜学报》1936年第3、4合期。

⑥ 《叶昌炽研究》,第155页。

⑦ 荀况《荀子》卷四《儒效》,《丛书集成初编》,上海商务印书馆1919年版,第512册,第138—139页。

据学路数，于经学、史学、子学和文学有较为深入的研究。他们学有师承，如叶昌炽受业于冯桂芬、潘祖荫和黄彭年等经学家；伦明转益多师，对他影响最深的有李慈铭、康有为、章太炎、梁启超、黄节、姚茫父、王国维、陈垣、刘师培、马叙伦和洗玉清；王謇先后就学于沈修、黄人、章太炎、金松岑、吴梅诸师；徐信符“平居慕谭玉生、黄石溪两先生”^①；吴则虞“学词赋于石遗先生，攻文字训诂于太炎先生”^②。

叶昌炽十分注意在文中表明师传，彰显家数，推重学统，其咏座师潘祖荫诗云：“雷塘弟子追成录，雪苑宾僚忆赋诗。犹是羽陵亲到处，不堪东阁再窥时。”^③诗中的潘祖荫（1830—1890），字伯寅，号郑庵，苏州人，咸丰二年（1852）进士，初授翰林院编修，后历任工部、刑部、礼部、兵部尚书等职，逝世后清廷赠谥“文勤”。叶昌炽对潘祖荫以师礼相待，二人过从甚密。光绪十年（1884），叶昌炽馆于潘祖荫家，为其校刻《功顺堂丛书》，并编撰《滂喜斋藏书记》，其家所藏宋元秘籍皆得以观。《藏书记事诗》初稿撰成之时，潘祖荫阅后，赞叹不已，愿出资刊刻，然不久病重，弥留之际还念念不忘此书的清本缮写工作。

后续诸家秉承叶氏书法，推重师法。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首记叶昌炽，诗云：“买书难遇盲书贾，管教仍然老教官。芸香浓处多吾辈，广觅同心叙古观。”伦明平生最推服叶氏，此书明言“例依叶书”^④。王謇《续补藏书纪事诗》记载亲眼所见之藏书家，最为亲切者当为几位业师，诸师学问渊博，藏书丰富，王謇为他们人各一传，既表彰他们的藏书成就，更表达出景仰之情。如沈修传文云：“不才束发受书，即粗识考据门径，实由先生启之。”^⑤黄人传文云：“予小子侍师久，明遗民、清学者事迹最为耳熟能详。”^⑥记载他们藏书成就的同时，也赞美了诸师风范，并铭记所领受之教诲。

（三）综述藏书渊源递嬗

私人藏书家以毕生的精力聚书藏书、修书补书、买书卖书、读书校书，甚至著书刻书，他们与文化的创造、传播有着直接关系。因此，藏书史是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藏书纪事诗“所写有关藏书家的著作，都是研究和编写中国图书馆事业发展史不可缺少的参考资料”^⑦，各书在综述藏书渊源递嬗方面的主要成就有如下几个方面。

第一，反映藏书形势新变。在钞本时代，图书以官藏为主；到刻本时代，官藏与私藏并盛，古代藏书文化迎来了辉煌时期。近代以来，受西学东渐影响，西方先进的印刷技术和公共图书馆制度传入中国，藏书形势发生了新变。藏书纪事诗能够及时反映这一变化：有书估肆行，“掠书之贾始河南、北、山东、西，渐推及苏、浙、皖、赣，又渐推及川、陕、闽、粤，极于滇、桂，挨家而索，等于竭泽。百数十年来之积蓄，尽于一旦；万数千里之输送，集于一隅”^⑧；有新兴藏书群体，“近来银行家，多喜藏书”^⑨，这类新兴藏书家亦有独具慧眼者，“某工商家得宋槧《论衡》足本，周季貺书抄阁题跋中所谓平生未见者也”^⑩；有各地公共图书馆的建设，“广雅书局规模宏伟，临于濠上，擅水木清华之

① 徐信符《广东藏书记略》，广东文物展览会编印《广东文物》卷九，中国文化协进会1941年版，第3册，第857页。

② 《悼念我的父亲——吴则虞教授》。

③ 《藏书纪事诗》卷六，第690页。

④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自序》，第3页。

⑤ 《续补藏书纪事诗》，第1页。

⑥ 《续补藏书纪事诗》，第2页。

⑦ 李希泌《续补藏书纪事诗前言》，《续补藏书纪事诗》，第2页。

⑧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自序》，第4页。

⑨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第131页。

⑩ 《续补藏书纪事诗》，第68页。

胜。……自宣统而后，书局停办，改为省立广东图书馆”^①，等等。

第二，追踪私家藏书流向。古代私家藏书旋聚旋散现象极为普遍，这一问题引起了前代许多学者的注意，藏书纪事诗作者对此极为关注，诸作对所传藏书家尽可能地交代其藏书去向。如伦明记载丁日昌藏书散出情况说：“持静斋书之散出，世人多不知其故，亦不知其始于何时。以余所闻，揭阳城内书店多家，专伺丁书。书之出也，悉由婢仆之手，多少精劣全缺一。久之又久，而书已尽。广州有华英书局者，亦分支店于揭阳，有所得，随寄广州。”^②读来令人扼腕。王謇记孙毓修藏书下落说：“其长君贵定，犹能世守之。抗战之役，藏之中国银行保险库中。敌人以电火灼之，不能启。乱平后，取出，余犹得在其上海花园坊寓邸纵观之。今贵定下世，遗物恐不堪问矣。先是，远在抗战前，留庵故后，其家人斥其所藏之部分展转以入我吴百双楼书店，余得锡山安氏一家言数种，诗文咸有之。揭来上海，迁徙无常，竟至遗失。后闻由沪贾收得，售诸专收锡山先哲遗著之锡邑寓公某。某后以不励气节败，书闻已入公家矣。”^③线索十分清晰。

藏书纪事诗创作愈到后来，著者对于藏书流向的追踪愈加清晰。如《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记载盛宣怀藏书散出情况：“盛氏故后，其藏书于抗战中屡见散出，中国书店曾整批购下数十箱，散售而尽。余书一部分于1934年由其家属分别捐入圣约翰大学、交通大学及山西铭贤学校，其中不乏稀世珍品。”^④并记载了散往各处典籍的具体数目，十分详细。

第三，追溯一书形成与流传。书是藏书文化的核心，是藏书家精神所寄，亦是藏书纪事诗撰述的重点，藏书纪事诗往往一斑窥豹，追溯一书形成与流传，彰显藏书家成就。叶昌炽《藏书纪事诗》集各类前代文献记载，多著录藏书室与藏书印，从而窥知该书的流传。伦明以后诸人所作藏书纪事诗多载亲身见闻，于一书之形成和流传更为详尽。如王謇记述黄丕烈题跋成书过程云：“李文旂于辛亥后辑印《士礼居题跋补录》。是书早有潘、江、缪、王四辑本，递相补益。潘郑庵（祖荫）初编有滂喜斋自刻本，江建赧（标）续编有灵鹫阁自刻本，缪筱珊（荃孙）初辑《士礼居藏书题跋再续编》，有风雨楼印行本，继又汇章式之（钰）辈续辑之跋，合潘、江所辑，统编为《菴圃藏刻书题识》，有云轮阁自刻本。王欣夫（大隆）又辑补之，有学礼堂自刻本。文旂承四家之后，搜罗较难，而能哀然成册，非易事也。”^⑤再如《书目答问》一书，学界皆知为缪荃孙代张之洞所作，但书成之时缪氏尚仅二十四岁，如何有如此之博大学识？伦明转述陈慈首的话，解开了这个谜团：“是书盖江阴一老贡生所作。先生得其稿，又与张之洞共参酌成者。”^⑥陈慈首曾在江阴做过县令，其说或当有据，这个记载对于研究《书目答问》的成书极为重要。

三 文学史意义

“习玩为理，事久则读，在乎文章，弥患凡旧。若无新变，不能代雄。”^⑦此话揭示了诗文创作的一个道理：如果一味模拟，没有创新，就永远不能成为一代之雄。藏书纪事诗将绝句和传文有机结合，诗句虽短，但蕴含了丰富的内容，与传文相映成趣，起到画龙点睛、提纲挈领的作用。同时，叶昌炽、伦明等人倾注个人感悟，创造了以纪事、唯实、唯真为特点的诗学思维或诗学模式，文学史意义十分

① 《广东藏书纪事诗稿》，第79页。

②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第14—15页。

③ 《续补藏书纪事诗》，第37—38页。

④ 《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第6页。

⑤ 《续补藏书纪事诗》，第58页。

⑥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第42页。

⑦ 萧子显《南齐书》卷五二《文学传论》，中华书局1972年版，第2册，第908页。

突出。

(一)“别开生面”的藏书家史诗

叶昌炽等人以刻画藏书家形象为中心,创造出新的文学样式——“藏书纪事诗体”^①。首倡这一说法者为胡道静先生,他称赞这一诗体“把古今藏书家的珍闻逸事搜集在一起,对每人或每几个有关系的人合在一块,分别叙事,并各系以绝句一首,写得那么清新、亲切,这个创造,前无古人。无论在内容上或体裁上,都铸出了一种新的格局”^②。这种新格局的铸造,与叶昌炽等人的刻意追求密不可分,叶氏曾谈及自己编撰《治墙室集帖》说:“取篋中松雪书三种,附以明人精刻各种、国朝杨大瓢书一通,合装上下二册,题曰《治墙室集帖》,此为第一集,以后随时裒辑,以较诸家法帖转展裨贩者为别开生面。”^③“别开生面”是叶昌炽编撰文集的一贯追求,《藏书纪事诗》最为代表(叶昌炽《语石》也属于“别开生面”的代表作),伦明等人著述紧紧相承。

一方面,“诗”与“史”的有机结合。如果把藏书纪事诗当作纯粹的藏书家史看待,那么搜辑大量资料而成的传文和注文足以说明问题了。但是,叶昌炽等人并不愿仅仅局限于客观反映历史,停留在撰写藏书家传记这一层面上,他们要在“史”的基础上继续升华,与“诗”的创作技巧有机结合起来,从文学的层面彰显藏书家的精神特质。这是因为,诗歌是所有文学体裁中最有意境,最能抒情的,它对语言的淬炼、运用,对思想感情的表达,往往能够融入国民的血液中,成为一种精神传统。藏书纪事诗的这一做法,与古典小说、戏曲等的开场诗或结尾诗一样,有凝练,有总结,还有引人深思的意味,在诗句中品味传文,在传文中寻找诗意。它不独是古代文人独有的兴味体现,也是读者审美感受的需求,具有深远的文化意义。

“诗以纪事,事即注于下,往往合数事以成一诗,鳞次分注,详载书名,并列总目于首,登记作者姓氏。”^④沈嘉辙等人给藏书纪事诗拟定的基本体例,为叶昌炽创作《藏书纪事诗》提供了范例。这种文体创作的着力点在于精心结撰诗歌和广泛搜集史料,诗主吟咏,史重质实,诗史互证。尤其是纪事之“纪”兼有“记”、“系”之意,人物和史实相系联,如网缀珠,大量运用了正史、方志、家谱、笔记等史料,深见史料搜辑之功。但是这一资料安排格局并不是一成不变的。伦明等人的后续之作,仍然将诗歌创作作为着力点,传文则多有变化,多亲见亲闻,由短文构成,单列开来,这些短文就是一篇篇短小精悍的人物传记,也是脍炙人口的学术小品。

另一方面,别出心裁的传主选择。古诗中的人物多种多样,而以帝王、祖先、英雄、志士、征夫、离妇、游子等为主。藏书纪事诗却能够超越传统,以史上藏书家为咏歌对象,凸显他们藏书、爱书、著书、刻书中的奉献精神。叶昌炽大致将藏书家以时代归类,“正史有传者,据史为次;有科目者,以释褐先后为次;无者,以同时人序、跋、赠答参稽而互订之”^⑤,全书条目排列有序、类例分明。伦明《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虽明言“例依叶书”,但略有变化,“大抵据志乘、说部、别集信而有征者。若乃其事其人,耳目触接,远不一世,近在当前,不烦摭拾,涉想即至,及今不述,久且忘之”^⑥。此外,叶书收录人物始于五代毋昭裔,止于清末蒋凤藻,存者不录。而后续之书却大量著录在世之藏书家,这些藏书家多与著者过往甚密,如伦明所记“识之厂肆”^⑦的沈应奎、张允亮等,王謩所记沈修、黄人、章太炎、金天翮、吴梅等。

① 傅璇琮和谢灼华先生称之为“纪事诗体藏书家传”体例,参见《中国藏书通史》,下册,第1020页。

② 胡道静《谈“〈藏书纪事诗〉体”》,《读书》1988年第1期。

③ 叶昌炽《缘督庐日记钞》卷七,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版,第3册,第369页。

④ 沈嘉辙等《南宋杂事诗》卷首《凡例》,清康熙间武林芹香斋刻本,第10a页。

⑤ 《藏书纪事诗》叶氏语,第30页。

⑥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自序》,第3页。

⑦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第90页。

在古代社会,妇女地位低下,男尊女卑的观念根深蒂固。但是藏书纪事诗不受传统观念束缚,不仅为女性藏书家立传,而且表扬了一批书贾、写工、刻工、印刷工及装订工等,这些名不见经传之人尽自己所能,同样为古代典籍的流传作出了贡献,理应讴歌。

正是因为追求“别开生面”的创作原则,藏书纪事诗成为史书新秀、诗坛奇葩。

(二)“节短韵长”的诗法风尚

《南宋杂事诗》“意主纪事,不在修词”^①,重视资料的搜集,而忽视诗歌艺术的提炼。藏书纪事诗则不然,诗句虽短却蕴含了丰富的内容,与传文相映成趣,起到画龙点睛、提纲挈领的作用,尽可能全面反映传主生平、藏书特色及学术成就,郑逸梅因此给以“丝丝入扣,节短韵长,耐人玩索”^②的高度评价。

藏书纪事诗所用诗体为七言绝句,不过也略有变化,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中就出现了少量的律诗和组诗。藏书纪事诗诸作在注重文采之外,更重概述藏书家之精神。

一是歌颂藏书家保护图籍的献身精神。古代多数藏书家能够倾注终生精力,节衣缩食,朝夕访求,视书籍为生命。他们在灾难面前首先想到的是保护典籍,为古代文化的存传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如民国时江苏省立苏州图书馆馆长蒋镜寰先生,在日寇来袭之际,冒着生命危险将馆藏善本藏在洞庭东西山上,王謇诗赞曰:“文选书录盈一卷,版本问答近百条。急公好义如己事,寇来携篋藏山椒。”^③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藏书家刘公鲁身上,面对外敌入侵,全家往无锡避难,家人促其行,他却坚不为动,誓与藏书共存亡,《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赞道:“可怜寇逼巢倾际,手抱楹书不上船。”^④

二是赞扬藏书家爱书如痴的动人事迹。如清代著名藏书家黄丕烈,常常在其读未见书斋举办仪式,祭祀所得之新书,痴绝之态几与唐代祭诗之贾岛相埒,叶昌炽诗赞曰:“得书图共祭书诗,但见咸宜绝妙词。翁不死时书不死,似魔似佞又如痴。”^⑤又如四川学者赖素酷爱明清集部,七十岁那年大病一场,几乎夺命。第二年入京,拟将藏书鬻于孝贤阁,进店之后却又从店中搜寻明清集部百十种,急急付款捆载归家。其女谏阻,他说:“此我平生所未见者,姑买之。”客人说:“君老病且贫,以巨金易此何为?”赖素笑曰:“吾敬惜字纸耳。”吴则虞为之诗云:“人生鞅鞅本堪伤,悴叶轻凋十月霜。”^⑥

三是记载藏书家的奇闻轶事。藏书纪事诗诸作者善于在简炼的诗句中“发潜德之幽光,为先贤所未有”^⑦,揭示藏书家们不为人知的奇闻轶事,为书林增佳话。如明代太仓人王世贞酷嗜孤本,藏书三万余卷,曾以一座山庄换取宋刻两《汉书》,书林传为奇事,叶昌炽诗赞云:“得一奇书失一庄,团焦犹恋旧青箱。”^⑧伦明凭借自己多年在琉璃厂开旧书店经历,熟知许多藏书家的秘闻,如正文斋书店主人谭笃生精熟版本,光宣间执书业牛耳,惟好以贗本欺人,又内监时盗内府书出售于谭,因以起家,伦明因此讥之曰:“五载春明熟老谭,偶谈录略亦能谙。颇传照乘多鱼目,黄帙宸章出内监。”^⑨

四是评述藏书家的学术方法与成就。古代藏书家大多是学问家,他们通过藏书助益为学,又因为学而精于藏书,藏书纪事诗于此多有述评。如清代广东学者陈澧,于经史子集、天文地理、乐律算术无不研究,其所藏书,四部悉备,无不有批评点校,何日起何日讫,所书评语,或朱或墨,庄重不苟。

① 永瑢等《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〇,中华书局1965年版,下册,第1733页。

② 《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序》,《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卷首第1页。

③ 《续补藏书纪事诗》,第59页。

④ 《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第61页。

⑤ 《藏书纪事诗》卷五,第573页。

⑥ 《续藏书纪事诗(关于四川藏书家部分)》。

⑦ 叶德辉《书林清话序》,广陵书社2007年版,第1页。

⑧ 《藏书纪事诗》卷三,第219页。

⑨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第133页。

徐信符曾阅其所著《东塾读书记》，极为赞赏说：“观其手稿，又可知其治学方法，凡阅一书，取其精要语，命门人写于别纸。通行之书，则直剪而出之，始分某书，继分某章、某句、某字，连缀为一，然后下以己见，评其得失，如司法官搜集证据，然后据以定案。”并为之诗曰：“传鉴堂前东塾楼，穷经正变熟源流。读书最要识家法，好向微言大义求。”^①

藏书纪事之诗要在短短二十八个字之内表达丰富的内容，加上传文已经把藏书家的生平资料和藏书成就交代出来，因而是否还有必要再提炼成诗歌，许多学者提出异议。如陈垣先生直言：“这么多材料，却用诗表示出来，未免减低了价值。”^② 陈垣先生为史学大家，其囿于史学立场来评价诗歌创作，自然很不看好。

刘勰《文心雕龙·物色》中指出《诗经》中的许多诗“以少总多，情貌无遗矣”^③，从这个角度来看，藏书纪事诗的艺术成就还是很明显的。诗作紧扣传主的生活经历和藏书活动，揭示出他们的藏书特色、藏书渊源、藏书聚散和为藏书所付出的艰辛，具有高度的浓缩与概括水平。如叶昌炽咏刘仪凤道：“巷泥尺深云知磬，写书不畏言官弹。两舟已达普慈岸，一舟不渡秭归滩。”^④ 按，宋代藏书家刘仪凤在朝中十余年，每归家则闭户读书，以薪俸所入半数用于购书，收藏图书达数万卷。他不乐家事，终日校讎，以至杜门绝交。同朝张之纲参本奏他有传录秘阁图书以进私室之嫌，遂以旷废公职而罢官。归蜀时以三船载书，一船在秭归搁浅，另有二船归乡。这是一段复杂曲折的故事，而叶昌炽则浓缩在一首七言绝句中，可见诗作的概括能力与水平。

藏书纪事之诗巧用所引资料的语言敷衍而成，而又能够突出传主的主要事迹和藏书风格。叶昌炽将这一诗歌创作手法运用纯熟，如宋人黄伯思嗜书成痴，李纲《左朝奉郎行秘书省秘书郎赠左朝请郎黄公墓志铭》中有“所至虽假室暂寓，必求明窗净几”，楼钥《跋〈东观余论〉》有“尽见太清楼所藏异书”，张萱《疑耀》有“得鸡林小纸一卷，书章草《急就》，余尝疑之。幸获校秘阁书籍，每见宋板书多以官府文牒翻其背以印行”等文，叶氏敷衍上述几处文字成诗：“净几明窗善校讎，古书曾见太清楼。赫蹄留得鸡林纸，两面文从牒背求。”^⑤ 伦明亦深得此法，他为邓邦述作传云：“君自序称：‘昔借债以买书，今鬻书以偿债。’嗜书者有同慨焉。君于近代本，殊多茫昧，如沈果堂《释骨》一篇，有单行写刻本，果堂集中亦有此篇。乃收一传抄本，且疑未曾付刻，如此之类，难免舛陋之讥矣。”据此诗曰：“半生仕宦为书穷，可奈书随债俱空。群碧徒知尊古本，一篇《释骨》语懵懵。”^⑥ 诗与传相得益彰，对照阅读令人会心一笑。

藏书纪事之诗虽不追求韵味和韵律，但非率尔为之，草草拼凑，相反，很多诗歌语言活泼俏皮。如嘉应吴兰修虽有多篇诗作问世，但长于考证，不愿称诗人，故徐信符诗曰：“呼作诗人难瞑目，每从考订见心灵。桐花词馆饶清韵，家法依然独守经。”^⑦ 陈伯陶常与人辩董小宛事，伦明为之诗云：“酥醪观里一黄冠，共古遗民守岁寒。间为梅村笺本事，董姬原未入侯门。”^⑧ 以诗歌著称的叶昌炽更能够打破常规，他作诗不死抠平仄和韵脚，如：“这个几时近饭吃，那个几时近饭吃？磊磊落落囊中物，不

① 《广东藏书纪事诗稿》，第75—76页。

② 牟润孙《励耘书屋问学回忆——陈援庵先生诞生百年纪念感言》，转引自胡文辉《现代学林点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146页。

③ 刘勰著，黄叔琳注，李详补注，杨明照校注补遗《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华书局2012年版，中册，第563页。

④ 《藏书纪事诗》卷一，第51页。

⑤ 《藏书纪事诗》卷一，第41页。

⑥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第39页。

⑦ 《广东藏书纪事诗稿》，第70页。

⑧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第29页。

觉绝倒座上客。”^① 还有的绝句不受诗律拘束，如：“我城令君之才子，汲古季子之妇翁，东涧老人之高足，其友则大冯小冯。”^② 非诗坛高手，岂敢如此？

（三）“情辞谨严”的性情文学

《文心雕龙·物色》云：“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沉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既随物以宛转；属采附声，亦与心而徘徊。”^③ 这里“随物宛转”和“与心徘徊”，说的就是创作主体与客体之间相通互融。藏书纪事诗诸作者倾注个人感悟，以纪事、唯真的诗学思维，构成了情辞谨严的艺术特色。

诗中有个人遭际之叹。如叶昌炽在日记中说：“余《藏书纪事诗》有‘礼堂翻定童乌本，痛极优昙顷刻花’，咏晁东吴也，遂为亡儿诗讖。”^④ 童乌是汉扬雄的儿子，慧而幼夭，后指早慧而夭折的儿子为童乌，为其刊印的书称“童乌本”。按，“礼堂翻定童乌本，痛极优昙顷刻花”诗句在《藏书纪事诗》卷三，为咏明代濮阳晁璠、晁东吴父子，该诗后叶昌炽自注云：“亡儿恭彝，生于同治甲戌岁（1874），体羸而嗜学。余每得古碑精槧，助余著录，喜形于色。尤留心乡邦文字，某人著某书，或存或佚，随问随答，了如指掌。盖其沉默强识，天性然也。去岁春，忽得气虚肿症，百治不瘳。至十月朔，竟不起，年适二十三岁。此章不幸，遂成诗讖。悠悠苍天，尚何言哉！”^⑤ 读来令人欷歔。

诗作容纳了藏书家个人遭际和世事纷纭之变。如伦明咏袁克文：“一时俊物走权家，容易归他又叛他。开卷赫然皇二子，世间何时不昙花。”^⑥ 袁世凯当国时，袁克文凭皇二子身份四处搜罗珍本古籍，以满足自己的典藏癖好，可以说只要他相中的典籍，没有得不到的。但是，其父帝王梦碎后，袁克文苦心经营的善本古籍很快散出府邸，此诗言藏书细事，而极世情变幻，读来给人无限遐想。

诗作穿插史料，赞美藏书家之超拔气节。徐信符记载广东顺德藏书家梁梅“有《春堂藏书图》，盖子春尝刳股疗母，家藏古籍甚多，皆母典钗珥所购。母卒后，因绘此图，以纪母恩”。诗云：“芝草琅玕爱日徐，晨昏定省乐何如。门前债客多于鲫，犹典衣裘购异书。”^⑦ 王謇记载钱强斋“久任律师，不受非法请托，不受脱辐反目劫杀血手及一切显见理曲之事，世称之为三不接。时军阀用事。君不亢不卑，不激不随，而又隐副之以不屈不挠。凡以政治获谴者为营救之，故志士家属感之入骨髓”^⑧。《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记载王植善创办私立南洋中学说：“其妹夫为‘五四’时期的外交总长曹汝霖，先生深鄙其人，虽资金匮乏，从不向其求援。老友请其出任吴县县长，亦为学校计，终不为所动。先生一生自奉俭约，于书则不吝重值。”^⑨ 上述藏书家事迹，通过藏书纪事诗的传播，中国知识分子孝养至亲、不畏强权等传统美德得以彰显。

（四）“披沙拣金”的文学史料

今人邱睿评藏书纪事诗说：“观者不能徒以‘诗’名之，否则太浅；又不能徒以‘史’名之，否则太板，其书也非传统意义上的‘诗史’之名可以囊括，在翔实的锦瑟自笺中别有深心。”^⑩ 藏书纪事诗也一样，可称为史学与诗学的双璧合一。诗注结合的形式，在征引了浩繁典籍的同时，保存了丰富

① 《藏书纪事诗》卷七，第721页。

② 《藏书纪事诗》卷三，第329页。

③ 《增订文心雕龙校注》，中册，第563页。

④ 《缘督庐日记钞》卷八，第2册，第482页。

⑤ 《藏书纪事诗》卷三，第206页。

⑥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第92页。

⑦ 《广东藏书纪事诗稿》，第73页。

⑧ 《续补藏书纪事诗》，第30页。

⑨ 《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第30页。

⑩ 《别裁诗史补心史——论清代雍乾咏史诗集〈南宋杂事诗〉、〈明史杂咏〉》。

的文学史料。

首先,保存文人传记资料。叶昌炽为吴翌凤作传时,曾引吴寿暘《赠梅庵诗》:“槐市幽栖比鹤巢,高风几为俗情淆。”并将吴诗自注一并引用:“先生居吴之槐树街。”^① 据此可知吴翌凤居住吴门时的住所。再如近代苏州诗人马授,字畴璞,号厄斋,撰有《厄斋诗钞》,王謇为吴慰祖立传时附记之云:“厄斋,一字危园,治经术,善诗古文,与纂图书集成。以荐授兴平仓监督。岁余报罢。贫甚,依长芦盐运使程学田于津门,老且病伛而著述,竟客死。其全集在学田所。见拙藏《厄斋陶诗本义》大兴吴肇元(会昭)所为序言。昔年修邑志,未为立传,并志于此。”^②

其次,记载文集的编纂与流传。清人孙从添说:“经为上,史次之,子、集又次之。”^③ 道出了古代藏书重经史、轻子集的现象。藏书纪事诗诸作则不然,传文中记载了诸多文集的成书或流传,有助于文学研究者利用。如周退密、宋路霞记载叶恭绰编辑《全清词钞》云:“1929年起为编辑《全清词钞》刻意收集清人词集,并邀请诗词同好,文坛名流朱彊村、夏剑丞、冒鹤亭、龙榆生等共同征集,先后得书五千余种,收入《全清词钞》者3196家,尚有千余家未能收入,间有罕见秘籍为海内所仅见者。”^④ 再如伦明撰写的陈融传文说:“番禺陈颙庵融,方纂《清诗纪事》,广收近代诗集,至千数百家。尝致余书,托就近代鉴别,云除甚咸者外,皆可用也。近人陈石遗衍成《元诗纪事》,陈松山成《明诗纪事》,君之《清诗纪事》又将成矣。陈陈相因,亦艺林一佳话也。”^⑤ 此段短文不啻为近代古诗纪事创作小史。

最后,收录各类人佚诗多首,编纂文集者可从中辑佚。如王謇在《章炳麟》一文中收录章太炎夫人汤国黎《梅不花》诗一首:“楼外梅花著意栽,楼头鹤去不重来。天寒岁暮谁相守,独抱冬心冷不开。”^⑥ 王謇为章氏入室弟子,记载当不误。又如番禺人梁鼎芬,晚年焚烧平生诗文,并立遗嘱要求勿留一字在世上,徐信符《广东藏书纪事诗》则为之辑佚,收录梁氏诗作《毋暇斋》、《腊朔自米市胡同移居栖凤楼》、《店中书寄妻弟》、《种花诗三首》、《上元夜饮图沈乙庵侍郎属题》、《所持翁遗墨》、《蔬园绝句》、《乙庵移居诗和韵》诸诗,甚为珍贵。

前人曾谓藏书纪事诗之作“乃二百数十年间无人荟萃之创作。文字一日不灭,此书必永存天壤”^⑦。藏书纪事诗为学术界开辟了古代文化研究的一个新领域,新颖的诗歌形式、发达的藏书历史、丰富的藏书史料,令学术界不得不为之驻足瞩目。

[作者简介] 周生杰,苏州大学文学院教授。出版过专著《太平御览研究》等。

(责任编辑 马 昕)

① 《藏书纪事诗》卷五,第539页。

② 《续补藏书纪事诗》,第64页。

③ 孙从添《藏书记要》(与祁承燾《藏书记》合刊),广陵书社2010年版,第41页。

④ 《上海近代藏书纪事诗》,第41页。

⑤ 《辛亥以来藏书纪事诗》,第105页。

⑥ 《续补藏书纪事诗》,第3页。

⑦ 吴郁生《缘督庐日记钞序》,《缘督庐日记钞》,第1册,第2页。